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口经济学新论 / 刘家强主编. —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501-0000-0

I.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人口经济学新论—研究生—教材 IV. ①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000000 号

人口经济学新论

刘家强主编

责任编辑 李摇才

封面设计 郭海宁

出版发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http://www.swufe.cn

电子邮件：swufe@swufe.cn

邮政编码：610074

电 话：028-85396363

印 刷：郫县科技书刊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1-0000-0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封底无防伪标志不得销售。

目摇录

第一章摇两种生产理论及其发展	(员)
第一节摇两种生产理论的起源	(员)
第二节摇两种生产理论的三次论战	(猿)
第三节摇三次论战的评述与两种生产理论的形成	(愿)
第四节摇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	(员猿)
第二章摇生育率的经济分析	(员愿)
第一节摇莱宾斯坦的成本—效用分析	(员怨)
第二节摇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	(圆园)
第三节摇伊斯特林的生育率供给与需求理论	(圆园)
第三章摇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猿源)
第一节摇人力资本理论的思想渊源	(猿源)
第二节摇马克思主义人力资本理论	(猿园)
第三节摇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源圆)
第四节摇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源元)
第五节摇国内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现状及发展	(缘)
第四章摇就业与社会保障理论	(缘元)
第一节摇西方就业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缘元)
第二节摇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远)
第三节摇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及发展	(远)
第四节摇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理论及其发展	(苑)
第五章摇人口转变理论	(愿)
第一节摇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概述	(愿)
第二节摇人口转变模式之比较	(愿)
第三节摇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再发展	(怨)

第六章摇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理论	(员源)
第一节摇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动因的探索	(员源)
第二节摇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规律的研究	(员源)
第三节摇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模式研究	(员源)
第四节摇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进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员源)
第七章摇适度人口理论	(员源)
第一节摇早期适度人口理论	(员源)
第二节摇现代适度人口理论	(员源)
第三节摇适度人口理论的演进及评论	(员源)
第八章摇关于贫困人口问题的研究	(员源)
第一节摇关于贫困人口研究的理论检索	(员源)
第二节摇贫困的标准	(员源)
第三节摇贫困的测量	(员源)
第四节摇圆世纪中国贫困人口及其变化	(员源)
第九章摇人口消费经济理论	(员源)
第一节摇早期人口消费理论	(员源)
第二节摇现代人口消费理论的主要流派	(员源)
第三节摇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主要论点及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员源)
第四节摇可持续消费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员源)
第十章摇生态人口资源环境	(员源)
第一节摇人类初始时期的朴素人口生态思想	(员源)
第二节摇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生态思想	(员源)
第三节摇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员源)
第四节摇悲观主义人口生态思想	(员源)
第五节摇人口生态思想的评价与未来取向	(员源)
第十一章摇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员源)
第一节摇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溯源	(员源)
第二节摇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员源)
第三节摇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	(员源)

第四节 摇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评述与未来取向	(四四)
第十二章 摇老龄人口经济理论	(四四)
第一节 摇老龄人口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	(四四)
第二节 摇西方老龄人口经济理论的内容构架	(四四)
第三节 摇我国老龄人口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	(四四)
第四节 摇老年经济学或老龄化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四四)
第五节 摇简评	(四四)
后记	(四四)

前摇言

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人口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人口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虽然以人口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人口经济学，自 18 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到 20 年代初形成以来，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随着人们对人口与经济两大领域相互关系的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新的人口经济思想的不断产生，人口经济学至今仍处在不断趋于成熟和完善之中。

人口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时间虽然是 18 世纪初期的事情，但它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以人口学和经济学中有关人口经济学说为基础，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众多人口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和完善而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的。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色诺芬关于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研究。早在 400 多年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孟子也有关于人口与土地关系的论述，如孔子的“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孔子《大学》第十章），即人口增长先于财富增长的观点，孟子“广土众民”的增加人口和“一夫百亩”等扩大人口与土地比例的观点；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有“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人口与财富的关系的著名论断，魁奈从人口与消费的关系出发论述了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倾向的思想（《中国的专制制度》法文版），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中阐述了关于人口增长与社会财富增长的关系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了人口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的思想，等等。上述古典经济学家都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人口问题，把人口问题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内在因素加以研究，为人口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马尔萨斯以“论人口原理和它对于社会将来的影响，附关于葛德文、康多塞及其著作的臆测之评论”为题，集中讨论了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使他成为早期庸俗人口经济理论的典型代表。

人口经济学从人口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 19 世纪 40 年代末期的事情。英国经济学家雷德韦于 1849 年出版了《减少人口经济学》一书，首次提出了人口经济学这个命题。他对降低人口增长率或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所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经济效益成正增长趋势。紧接着，1854 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穆克琪出版了《人口政治经济学》一书，探

讨了人口与经济、福利的相互关系。1957年，美国人口经济学家 援援斯彭格勒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正式使用了“人口经济学”这一命题，并对人口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作了概括性的论述。自此，西方学术界开始广泛使用并接受这一科学命题。虽然其称谓有所不同（有的以人口经济学（孕志春圃社翻译），有的以经济人口学（耕燥皂理阅皂燥燥燥）名称来发表论著），但都是以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主要对象。

在人口经济学形成过程中，众多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人口经济关系，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将人口作为独立变量，对人口增减与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汉森将此理论发展为长期停滞理论（1959年）。以海德劳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克服和弥补了凯恩斯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短期静态分析的缺陷，将其发展成为人口增长与经济长期动态分析，从宏观角度对人口增减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美国学者库兹涅茨是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作长期动态研究的典范，他创立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长波理论（1959年），并演绎为“库兹涅茨周期”，而其理论之不足处则由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伊斯特林将人口经济增长长波理论建立在生育率变动的基础上，着重研究经济变量对生育率的长期效应问题（1968年）。上述理论将宏观人口经济理论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宏观人口经济学。人口经济关系的研究领域也因此从一般的总量研究向结构性问题研究拓展。

在宏观人口经济学不断丰富和拓展过程中，微观人口经济学亦发展迅速，许多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作为社会生育细胞的家庭的状况及其生育的经济效应，产生了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理论和财富流理论，把人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宏观领域拓展到社会细胞——家庭。这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莱宾斯坦的《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1966年），美国人口经济学家 援援贝克尔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年）、《时间分配理论》（1964年），贝克尔与 匀援则援刘易斯合作的《论孩子数量与质量的相互关系》（1966年），伊斯特林的《生育率革命》（1968年），西蒙的《收入对生育率的影响》（1969年），考德威尔的《人口转变新议》（1972年）、《生育率下降理论》（1980年）等。

微观人口经济学说的研究对象是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行为、生育率的变动及其与经济的关系；其理论依据是从消费需求理论的角度把孩子看做是耐用消费品；研究方法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分析法和需求理论分析法。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家庭人口数量即家庭规模进行经济分析，探讨家庭规模决策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并提出微观人口经济分析的模型，这在人口经济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微观人口经济学说的研究成果被看做是人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 20世纪 70年代至 80年代期间，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和数学理论的发展，许多人口经济学家将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现代的人口分析技术应用于人口经济关系的研究中，运用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建立各种人口经济数量模型，使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变。比如，芝加哥派学者罗伯特·威利斯用家庭效用函数建立了孩子需求：数量质量替代模型（1959年）；伊斯特林建立了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模型（1963年）；库兹涅茨建立了人口—经济环路；伊斯特林做出了经济—人口环路分析；保罗·舒尔茨根据经济学原理于1963年提出了经济因素是死亡率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1963年），他设计的健康投入—产出函数，对死亡变动进行了多因素、多变量分析。

在人口迁移流动与经济研究方面，在原有的推力—拉力理论（赫伯尔，1948年）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和建立了人口迁移经济理论方面的宏观经济模型，其中主要有经济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模型、比较静态模型、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劳动转移模型（1966年）等。

在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人口经济规律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而且始终把人口与经济关系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从而科学地阐明了人口与经济规律的客观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理论。这是人口经济理论的深刻革命，其基本内容和观点包括：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创立的两种生产理论，即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②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阐明了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关于人口规律（包括人口经济规律）是社会规律、历史规律，而不是超自然规律的观念。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理论，虽然也是在其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加以研究和创立的，但其两种生产的原理却成为人口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为现代科学人口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宏观人口经济理论与微观人口经济理论框架建立起来以后，许多国家的人口经济学家，从人口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环节来深入分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得到了充分发展，以张纯元、李竞能、吴忠观为代表的中国人口经济学家关于人口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乃中国人口经济学家对人口经济理论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由张纯元为主编，李竞能、吴忠观为副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于1981年出版，这是60年代人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现代第一本人口经济学著作。这部专著，对人口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于：①在人口经济学理论体系方面有别于西方人口经济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经济思想为指导，从人口经济运动过程中的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经济思想等几个大方面展开分析，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一环扣一环，层层深入，形成了人口经济学新的理论体系。②提出与发展相协调的人口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具体体现。在分析人口经济运动过程时，对人口与劳动力资源、人口与经济结构变动以及宏观人口投资和家庭人口投资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人口与国民收入分

配、人口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等诸多人口经济关系均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人口增长变动、结构变动及其分布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并从中国人口众多的实际出发，揭示了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性。③提出了人口经济效益的新概念。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考察最优人口和最优人口经济效益，是人口经济学研究中的新课题。它不同于西方学者的适度人口研究，因为西方学者没有也不可能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他们脱离社会生产方式去考察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因而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中国人口经济学家关于最优人口和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的观点是基于一定历史时期并有一个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生产条件扩张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最优人口经济效益就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使国民经济发展取得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果。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绝非最大人口经济效益。最优人口经济效益是在不影响环境、资源的持续发展的条件下的人口经济协调发展效益。这不能不说是有远见卓识的见解，因为，这种理论观点不仅被 20 年代国际社会（如 1950 年开罗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所公认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观点所印证，而且也为中国现今所推崇的人口与生产、生活、生育的三结合的实践所证实。这是中国人口经济学家对人口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

随后不久，吴忠观编著的《人口经济学概说》（1953 年）一书，将上述理论进一步具体化，把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理论从人口的增长变动、结构变动及其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总过程即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内在关系进行系统分析，阐明了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性。他提出“人口经济学是以人类社会各个阶段上的人口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阐明人口经济运动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即人口经济规律”，不仅在人口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有新的发展，而且丰富、充实和发展了人口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学者强调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作用条件下来研究人口经济过程和人口经济关系，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关系的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来研究人口生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因此，当人们提高了人口与经济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刻认识之后，就能通过人们的自觉行动来调节人口与经济发展以及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这也是中国学者对现代人口经济学理论宝库的重要贡献之一。

在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以美国学者赫茨勒（1960 年）为代表的“人口危机论”是悲观主义的突出代表，他们在人口过剩、人口压力、人口危机理论出现以后，针对世界人口规模进一步膨胀、速度加快、势头迅猛而提出了人口爆炸的观点。梅多斯等人的增长极限论，将悲观主义人口经济理论推到极至。他们认为，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最

有影响的有五个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这五个因素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均源于人口增长，这样人类不要经过太长的时间就可能达到“危机水平”，并在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将要“崩溃”，“世界末日”将要来临，并按照其指数增长编制了世界模型。增长极限理论对人口经济关系的阐释实质上仍然属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范畴。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对增长形成因素和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了推进经济增长的对策，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赫曼·康恩（亨德里克·范·丹）和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詹姆斯·布坎南）等。乐观主义流派认为：第一，长期发展趋势的前景是会好的，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长期的经济增长对人类是有效的，不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第二，空间可望无限扩展，人类以地球为中心开展各种经济活动，将来可以开展到太空中去。而且，他们进一步从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动力两方面论证了人口经济关系，并分别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根据发达国家已实现人口转变的历史，得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也终将到来的结论。

生育率的经济理论是西方人口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生育率变动的经济效应的一种理论，其主要观点有莱宾斯坦的成本效应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和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等。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德里克·范·丹最先运用微观经济理论和成本效应概念进行家庭规模的成本效应分析，考察家庭生育决策，并建立了生育率变动的微观人口经济模型——成本效应理论。他认为，家庭规模的大小可以通过父母对孩子的数量决定来实现，即通过对孩子成本及效用的分析、比较和计算来决定。孩子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亦称机会成本）。莱宾斯坦把父母生育子女的行为看做是一项经济行为，花费了一定成本，必定应从孩子身上获得一定的收益和效用。孩子的效用有：①消费效用；②劳动—经济效用；③老年保障效用；④经济风险效用；⑤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⑥对家庭的扩大和发展做贡献的效用等。莱宾斯坦得出了收入负效应的结论，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均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成本上升而效用下降，因此生育率下降。莱宾斯坦的成本效用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家庭生育率问题，特别是他将决定生育意愿的因素按成本和效用两大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生育意愿的定量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在莱宾斯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主要探讨家庭对孩子需求的数量决策。他最先运用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行为理论来分析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和决策，创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贝克尔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家庭在其有限的收入范围内，随着其对消费需求的增加，将会为其经济的总效用极大化而努力。如果父母对生不生孩子要进行合理选择，就一定会把孩子当做耐用消费品。贝克尔的理论是针对发达国家经济收入水平上升而生育率水平下降的情况所进行的分析。他认为，增加对孩

子的投入，将会提高孩子质量，夫妇便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得最大效用，从而用孩子质量取代通过增加孩子数量所取得的效应。贝克尔关于家庭生育的理论，注重对孩子的质量和时间稀缺资源的分析，用需求理论和消费理论来解释家庭生育行为，并建立了孩子质量和数量的选择模型，为丰富微观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学者伊斯特林在莱宾斯坦和贝克尔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从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分析，转到研究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上。他探讨了生育率转变的内在机制及其作用过程，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理论模型，使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得到进一步发展。伊斯特林运用有关供给、需求和节育成本的理论来说明生育率革命发生的过程。他的供给—需求理论是以孩子的需求量、孩子的供给量、生育调节费用变量（又称生育控制成本）三个核心变量为主，进行多因素、多层次并全面考察生育率的转变，他的分析的一个突出特色是结合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过程来观察生育率的变动。他把社会现代化作为基本决定因素，既重视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又注意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这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转变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人口科学联盟主席、澳大利亚大学教授考德威尔（考德威尔）在分析生育率变动的社会机制时提出了代际财富流理论。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生育行为是理性的，生育高低是个人、夫妇、家庭权衡经济收益的结果，是由经济动因决定的，而经济动因又是社会条件决定的，最根本的条件是代际之间财富的流向和流量。在传统社会中，净财富流是由子代流向父代，在现代社会中，父辈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财富流由父代流向子代，教育成为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最重要因素。财富流理论将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由父母扩展到家庭其他成员甚至社区，这种研究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考德威尔从产业结构变动和教育发展程度探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家庭财富的流向和数量变化，以及促使生育率转变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生育率的经济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微观人口经济学。

以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弗雷·索维（索维）出版的《人口通论》（1964年）为代表的适度人口经济理论是当代人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理论从动态角度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说明人口增长可能给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和有利影响，以及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最适宜的关系，寻求适度人口增长率。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主要贡献有：①将现代适度人口、经济适度人口界定为在确定达到特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目标时，通过控制人口增长或鼓励人口增长来达到的适宜或适中人口数量。②提出了最高人口和最低人口两个基本概念。③指出影响适度人口目标实现的因素，诸如物资资源、技术水平、产品分配、国内经济稳定、人口年龄结构等。④提出了静态经济适度人口和动态经济适度人口的概念。⑤重视技术进步对适度人口的影响，技术进步能提高人口的适应度。⑥通过对适度人口增长率的探讨，把适度人口和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正如著名人口经济学家阿尔弗雷·索维所说：“索维把众所周知的适度人口的概念从适度人口规模扩大到适度人口增长率。”适度人口经济理论拓宽了人口经

济学的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以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是人口经济学发展史上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主要观点是：①劳动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要获得这种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需要花费一定费用，这就是投资，这种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会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产生巨大经济效益。②人力资本投资转化形式表现为：教育健康资本存量；知识存量；就业资本存量。③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效益。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才能，发挥更大经济效益。在当代世界经济中，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和作用：其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人口投资中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二，从人口投资结构的合理性来看，控制人口增长，减少人口数量投资，增加人口质量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人力资本理论为人口经济关系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促使人口经济学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伊斯特林分别从人口—经济环路和经济—人口环路，对国民收入、人口增长、收入与消费、生育率等变量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提出了人口增长长波理论。其中库兹涅茨把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的波动联系起来，提出了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伊斯特林在库兹涅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从经济—人口环路方面研究经济变量对生育率的长期效应问题，提出了收入—消费—生育率的正相关关系。库兹涅茨研究的是人口经济增长波动的外部原因，诸如迁移率、失业率、居民户增长率等人口指标的变动因素；而伊斯特林则深入到收入、现代化要素在生育率变动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中收入水平、消费期望水平与生育率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无疑将人口经济关系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不仅使人口经济增长理论更加完善，进一步拓宽了人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使该理论成为人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口经济学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以来，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完善和成熟阶段，成为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一门独立的边缘性社会科学。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人口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人口经济学自身研究内容的深化和领域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人口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从而形成新兴的边缘学科。

目前，相对成熟的人口经济学新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8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由普雷斯顿等九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发表的研究报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通过对人口增长减缓与非再生资源、再生资源、环境保护、生产资本、教育健康、收入分配、城市化等几个方面的关系进行多变量的分析，得出结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增长减缓，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同时指出：“那种对于人口

增长危言耸听或听之任之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研究将人口经济关系研究引向复杂多变的方向，这种分析将继续到 21 世纪，并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人口经济理论。

二是关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对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如中国人口控制到现今已处于更替水平时，面临着低生育率情况下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的情况，如何从生育的主体——育龄夫妇的内在动因方面进行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已经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和西方人口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题，相信这种研究将促进发展中国家人口经济理论的发展。

三是关于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人口投资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已由现在的注重定性分析转向了注重量化分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口质量系列指标体系、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和人类发展衡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如由中国人口学家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1990 年），对人口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进行了探索；1990 年以来，联合国开发署在每年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将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三个指标表示的生活水平，作为全球范围衡量一个国家人口发展程度的标志。

四是老年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美国经济学教授詹姆斯·亨德舒尔茨（James H. Schultz）1975 年在纽约出版的《老年经济学》一书于 1984 年再版后被许多大学用做教科书。该书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密切结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实际，对老年人口的变化以及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政府的老年经济政策、老年社会保障、老年人的价值观与再就业、退休金计划以及基金筹措与管理等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系统论述。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虽然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将其独立出来，对不断变化的人口与老年人的退休前景以及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已经超出了人口经济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所以人口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势必是某一些研究对象从人口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独立成为某一新兴的学科。

五是家庭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部分人口学者、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如美国著名人口学家 曼凯菲茨等）在深入研究家庭结构及其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学因素与家庭变动的相互关系后指出，在家庭迅速变化的情况下，无论从指导市场经济还是从帮助政府制订规划的角度，家庭预测都变得十分重要，并由此认为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学因素和家庭变动的相互关系的家庭人口经济学有可能应运而生。而且生产函数理论及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已经使建立各种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生育模型以及同类型家庭结构的转变模型均成为可能。这样，原来属于人口经济学中的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由于其内容的扩充，已远远超出了就收入与生育率变动关系进行研究的内容，因而将其研究内容扩展到整个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变动与家庭经济收入及孩子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上，从而形成了一门新兴的人口经济学分支学科——家庭人口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

六是关于市场人口问题的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欧美一些国家的工商企业在分析市场需求和项目投资的论证决策中，非常重视人口信息，以求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

而产生了市场人口学。其主要内容包括：人口与商品市场预测规划，人口特征与广告推销业务，建厂设店选址的人口地理分布，国际人口变动趋势与出口市场分析，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庭人口特征与退休、保健福利等支出分析，人寿保险业、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分析等等。市场人口学可以视为人口经济学中关于人口是消费者的分析与市场经营变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

此外，近年来，关于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综合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关于区域人口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关于群体人口经济行为（例如旅游人口经济学、女性人口经济学等）的研究，可以视为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新动向和发展趋势。

序

刘家强教授主编的《人口经济学新论》，即将公开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人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虽然是 19 世纪出现的事情，但是，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芬（希腊人）、柏拉图（希腊）、亚里士多德（希腊），中国的思想家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韩非子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探讨过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人口与国家盛衰的关系、人口与社会治乱的关系等等，其中已包含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萌芽。在近代，经济学产生以后，经济学家大都重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亚当·斯密（英国）、马尔萨斯（英国）、萨伊（法国）、约翰·穆勒（英国）一直到马歇尔（英国）都从经济角度研究人口问题，把人口看做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内在因素加以研究，诸如人口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关系、人口与财富增长的关系、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等等都在他们研究的范围内。特别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书，集中讨论了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口经济理论，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 世纪初，现代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凯恩斯（英国）和汉森（美国）也很重视人口问题研究，他们把人口因素纳入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如此，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是现代经济学家，他们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还是将其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的。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专门课题和独立学科提出来加以研究，是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1834 年英国经济学家雷德韦（英国）出版了《一种缩减人口的经济学》一书，首先使用了人口经济学这个命题。在书中他对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1844 年穆克琪（英国）出版了《人口政治经济学》，探讨了人口与经济福利的相互关系。1854 年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格勒（美国）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一文，论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内容、梗概。1856 年法国人口学家索维（法国）出版了《人口通论》，该书上册《增长经济学》，从经济方面分析了适度人口，提出了经济适度人口的概念。19 世纪 40 年代，特别是 50 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相继发表了有关人口经济学的著作和论文。如 1870 年美国出版了斯彭格勒的著作《人口经济学》，该书具有广泛的影响，被看做是西方人口经济学成熟的一个标志。1875 年澳大利亚出版了皮奇福特（英国）的《人口经济学导论》，1875 年英国出版了柯尔（英国）的《人口发展中的经济因素》、波汶（法国）的《经济学和人口学》，1876 年美国出版了西蒙（美国）的《人口增长经济学》，1878 年日本出版了安川正彬的

《人口经济学》等等。与此同时，在欧美一些大学里开设了有关人口经济学的课程。所有这些著作的问世和人口经济学课程的开设，实际上宣告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人口经济学的诞生。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不是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作零星的论述，而是把人口经济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同时，在这些人口经济学的论著中，也形成了一些反映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的科学范畴和科学规律，出现了以人口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人口经济学可以说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积累，在 圆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在 苑园年代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在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要晚一些，但是发展很快。员愿猿年我国出版了第一部由北京大学张纯元教授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以后，在 圆世纪 愿园年代，特别是 怨园年代，又有几部人口经济学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的着重阐述人口与经济的一般原理，有的着重结合我国实际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的主要评介西方人口经济学说，有的重点进行定性研究，有的侧重于定量分析。人口经济学的课程也在一些大学，特别是一些培养人口学和经济学研究生的大学广泛开设。人口经济学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完全不是一种偶然的現象，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人口经济问题十分突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如何才能得到协调发展，是摆在我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因此，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对我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人口经济学成为了我国热门的社会科学之一。在我国已出版的为数众多的人口经济学著作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然而，刘家强教授主编的这部新著决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的研究，而是站在新世纪——圆世纪开端的历史时刻，在总结 圆世纪人口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口经济学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我认为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有以下两点：

首先，把可持续发展的原理纳入了人口经济学。可持续发展是 圆世纪人类认识史上一次深刻的飞跃和巨大的变革。我国过去出版的人口经济学，比较强调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又是不够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最早是由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提出来的。员愿员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蕴圆源圆）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土地沙化、资源枯竭、石油耗尽、粮食短缺四大问题；第二部分提出了“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即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能源等。员愿苑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员愿圆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圆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订和组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实践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在 圆世纪取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成果。刘家强教授主编的这部新著，不仅在第十一章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可持续发

展，而且可以说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书的重点。在第一章关于两种生产理论到三种生产理论的提出，在第九章关于可持续消费理论的阐述、第十章生态人口资源环境、第十二章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等问题的研究中，都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也是本书的一大优点。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到可持续发展，不是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否定，而是一次补充和丰富，是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和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比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人口诚然要完整、全面，但是它仍然忽视了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到来，经济增长了，但资源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大气污染、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短缺，人类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所以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人类必然的选择。因此，在人口经济学中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是非常正确的，也是人口经济学一项重要的任务。

其次，十分重视国内外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把这些成果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比如，关于贫困人口问题的研究，在过去出版的人口经济学中很少有人论及。实际上，贫困人口问题，应该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理应纳入其研究范围。在当代，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中，都存在着数量不等的贫困人口。尽管他们贫困的程度不同，生活状况各异，但相对于该国或地区的非贫困人口来说，他们是处于困难境地的人群，是社会上一个脆弱群体，是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特殊关照的对象。人口经济学把贫困人口问题排斥在理论体系之外，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疏漏。本书对贫困概念的外延和内涵、贫困人口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贫困的标准、贫困的测量以及我国贫困人口及其变化都作了很好的分析，这无疑扩展了人口经济学的视野。又如，关于人力资本理论、关于就业与社会保障理论、关于人口转变理论等等，作者都根据国内外新近研究的成果，作了很好的补充。

总之，本书是一部很有特色，也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全书共计十二章，每章阐述一种理论，既包括宏观人口经济学的内容，也包括微观人口经济学的内容，是作者们参阅了大量文献后写成的。它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我们对人口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学习与研究。

吴忠观

二〇〇四年 苑月于光华园

第一章

两种生产理论及其发展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① 人口学家们普遍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石，当然也是人口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对人口再生产、物质资料再生产以及可持续发展主义者提出的生态环境再生产，也即两种生产理论以及后来所说的三种生产理论，历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

第一节 两种生产理论的起源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萌芽

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就开始了对于两种生产理论的论述。马克思将物质生产看做是人类历史的决定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述到：“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②

其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类自身生产的两个方面：^①依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物质资料生产）的产品所引起的第二种生产，即通过消费生活资料而再生产出原有的生命主体。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②人类的延续和人口增长的“自然的生殖”。

1877 年，美国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该书带来了人类对原始社会认识方面的一场大变革，即人类认识到氏族是原始社会基本的、原初的基层单位，明确把氏族与家庭区别开来，揭示了母系氏族在父系氏族之前的史实。母系氏族是族外婚（群婚）集团，因而这时不可能有家庭（家庭是父系制的产物）；生产资料原始公有制则与该社会基层单位自然联系在一起。在摩尔根那里，原始共产主义是以最紧密的方式与母系氏族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氏族共产主义出现的，所以，母系氏族向父系氏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10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

^②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年。